

郁达夫

- 文艺鉴赏上之偏 爱价值
 -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 中国人的善于模仿的秘诀
 - 二十四年我爱读的书
 - 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
 - 理智与情感的平衡
- 靳飞 靳雪卿 编

谈人生



郁达夫

100

[illegible][illegible]

© 2004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255: 103–110

100

100

100

100

100

3

W

1



● 名人谈人生丛书 ●

郁达夫谈人生

靳飞 靳雪卿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谈人生/靳飞, 靳雪卿编,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8

(名人谈人生丛书)

ISBN 7-5006-2888-9

I. 郁… II. ①靳… ②靳… III. 人生观-普及读物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551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5.5 印张 2 插页 88 千字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7.00 元

序

陈子善

谁都难以否认，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风格独特的一位，同时也是最易遭人误解的一位。我说郁达夫是“20世纪中国作家”，而不按以往的习惯说“中国现代作家”，是因为郁达夫不但在新文学即“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领域里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旧体诗词创作上也卓然成家，是吴梅村、黄仲则一派的传人。这样穿梭于新与旧、博古又通今的作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其实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其中，我一直认为郁达夫真率可爱，我喜欢郁达夫。

留学东瀛10年，在郁达夫的生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的新文学创作就是在日本起步的。他那部新文学史上第一本同时也是惊世骇俗的短篇小

说集《沉沦》所写的全是留学生涯的悲欢离合，《沉沦》和《银灰色的死》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其实都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正如他一再申明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当时我国青年学子在日本所经受的中西、中日之间的政治激荡和文化冲突对他们的心理和生理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些小说中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撼。相比之下，近年出现的一些“留学生文学”反而逊色多了。

人们在谈论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经常引用郁达夫那篇有名的《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中回忆他留学初期，即1914年7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之后读书经历的一段话：

这一年的功课虽则很紧，但我在课余之暇，也居然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纳夫（今译屠格涅夫——笔者注）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和西洋文学的接触开始了，以后就急转直下，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今译陀斯妥耶夫斯基——笔者注）、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证之以《沉沦》一书3篇小说和另一篇留学题材的《胃病》中所提到或引用的欧美作家，就有歌德、尼采、叔本华、海涅、彭斯、华滋华斯、拜伦、济慈、斯蒂文森、道生、吉辛、J·汤姆逊、M·毕尔邦、卢梭、雨果、威廉·

亨利、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邓南遮、爱默森、梭罗等，甚至于还有《圣经》，还有瓦格纳的歌剧《汤豪塞》，确实够惊人的，其中有些诗人和小说家直到今日，国内还未认真介绍过，足见郁达夫的回忆不虚。但郁达夫接着所说的“在高等学校里住了4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是一千部内外”，未免有些夸大。若以1000部小说计，4年之中每年要读250部，平均3天至少读2部，郁达夫英文和日文造诣再高，再囫圇吞枣，恐怕也是来不及的。

当然，郁达夫的“读小说之癖”在留学日本时养成，创作小说的冲动在留学日本时萌芽，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郁达夫的小说，特别是早期作品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现在也已成为郁达夫研究者的共识，早已有论者把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作过比较，现在又有论者把郁达夫与永井荷风进行比较的，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只是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至今未曾注意到郁达夫在《五六年创作生活的回顾》中紧接着上录引文之后所说的两句话：

“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

虽然郁达夫在这里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说明，但却透露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信息。我感到有趣的是，郁达夫留日期间在日本流行的“所谓软文学

作品”是指哪些作品？郁达夫到底读过哪些“软文学作品”？这些“软文学作品”对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如此等等，我认为都是值得认真探索和研讨的。

郁达夫早年的日记还有相当部分幸存于世，但在这些日记尚未全部公布之前，上述疑问恐怕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解答。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郁达夫所谓的“软文学作品”，并不包括欧美的经典名著，而是专指日本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流行文学，特别是“性文学”作品。有意思的是，《沉沦》书中提到和引用了那么多欧美作家，可谓包罗万象，提到日本作家的作品却只有惟一的一部，那就是《南迁》中“伊人”所读的“一册当时新出版的日本的小说《一妇人》”。据查考，《一妇人》是有岛武郎的长篇代表作，先连载于1911年《白桦》杂志，后于1919年6月由东京丛文阁出版单行本，恰恰也被归入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性文学”之列，虽然论者同时指出，在描写“灵与肉”的冲突中，《一妇人》对“性爱”的表现还很拘谨，不够大胆，与真正的“性文学”尚有相当的距离（参见榛叶英治《明治、大正、昭和前期作家的“性”描写》，载日本河出书房1992年7月初版《性的文学》）。

郁达夫的文学主张曾受有岛武郎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他的《文学概说》部分章节最初发表时，

郁达夫就坦率说明：编译“此稿所根据的是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的头上的几章”，“拾人牙慧，毫无新意”。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有可能受有岛武郎影响，却长期为论者所忽视。我之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这需要细心的爬梳辨析，远非《南迁》中提到一句就可坐实的。何况《一妇人》一般认为是“纯文学”而不是“软文学”。像相传是芥川龙之介所作的《戴红帽子的女人》和相传是永井荷风所作的《写在榻榻米移门上的小说》等大正时代著名的“艳本”（真正的“性文学”作品），因在极有限的范围里私下流传，郁达夫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未必能够读到，看来郁达夫所说的使他心醉神迷的“软文学”还得另行追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只能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却无力做深入的研讨。但我总觉得郁达夫早期小说与日本当时正在兴起的“性文学”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循此思路查考下去，也许会对近年来相对停滞的郁达夫研究注入活力，开辟新径，我期待着郁达夫研究的新突破。

话扯得太远了，该回到靳飞兄伉俪编选的这部颇有特色的《郁达夫谈人生》上来了。记得《追忆逝水年华》作者普鲁斯特还写过一部有名的《驳圣伯夫》，书中对他的前辈，19世纪法国大批评家圣伯夫宣扬的作家生平本位说大不以为然而强调作品本位。我同意普鲁斯特所主张的作品是作家“另一个

自我”的产物，作家真正的“自我”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但我同时也认为这“另一个自我”与作家的生平即作家表现在社会上的外在自我并不是绝然分隔，毫无关联的。作家生平本位说固然偏颇，完全无视作家生平也无助于把握作品的真髓。有关作家的一切可能的资料，包括作家自述、家族史、早期教育、书信、日记、同代人的回忆等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在研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是能够发挥有时是很重要的参考作用的。因此，读郁达夫的作品无疑应该读他的小说和诗词，但他形诸笔墨的未完成的自传，他的众多议论人生、社会、教育、文艺、道德、心理、爱情的坦诚的文字，同样应该好好读一读。它们对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深入理解郁达夫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富有启发性的参照系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编选这部《郁达夫谈人生》是很有必要的。

靳飞兄爱读郁达夫的作品，对郁达夫有独到的认识，这有他的洋洋数千言的《达夫文痕人迹》为证。他根据自己的独到认识分门别类、精心编排的这部选本，清晰地展示了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和复杂性格，凸现了郁达夫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一个作家就是那个执笔写作的人，而当他的生活被加以讨论的时候，就像是他的作品的一个译本。郁达夫的作品屡遭严重曲解，他的被人议论纷纷的生活更是成了拙劣的译本。他的“醇酒美人”长期为人所诟病，直至

今日，他在 30 年代中期的“婚变”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坊间一些浅薄无聊的传记和选本又大肆渲染，乃至把两位早已分道扬镳的当事人的文章作为“夫妻”创作合编成一集，愈加不伦不类，着实误导了不少读者。读一读这部严肃的而不是哗众取宠的选本，是可以驱散笼罩在郁达夫身上的许多迷雾的。

靳飞兄在《达夫文痕人迹》中引用了郁达夫 1915 年秋在东京所作的七律《日暮过九段偶占》，这首颇有情致的诗是我 18 年前在翻阅上海《神州日报》时发现的。没想到 18 年后的今天，我也到了东京，也是在日暮时分，与靳飞兄一起来到景色宜人的九段，边漫步边讨论郁达夫。只是今天的东京早已不是当年郁达夫笔下的东京了，除了本乡东京大学附近据说还有郁达夫当年居住过的“学生寮”和消磨过时光的幽雅的咖啡馆，像九段，以及上野、不恶池等郁达夫诗中吟哦过的所在，虽然仍为东京名胜，也早已面目全非，难以探访郁达夫的足迹了。然而，能在郁达夫生活过的东京，为靳飞兄伉俪编选的《郁达夫谈人生》作序，毕竟是一种新鲜的写作体验，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于是写下了上面这些话，与本书编者、读者一起共探说不尽的郁达夫的世界。

1997 年 12 月 7 日郁达夫 101 岁忌辰
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

达夫文痕人迹

靳 飞

仅是通过作品去认识作家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文如其人的话不可全信。说远的，李太白，名句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这大抵是醉后胡瞋，没有酒力作怪的时候，只恨天子不来呼，一旦听到些风声，立刻就“仰天大笑出门去”了，李白其人究竟如其哪句文呢？再说近的，由轻而重，轻的，读罢《老舍文集》十六卷，仍是不能想到老舍是清晨要坐在马桶上喝一杯咖啡而不是豆汁儿；重的，周作人笔下何等清淡且是腴润，我永爱他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然而，在他身后 20 余年公开的他早期与友人通信，津津乐道人是人非，如，“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

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无此意而凤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凤举自己尚未有印绶，惟其必有一颗印可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既酸又美。由此文推想周作人附逆总觉不可思议，由他对布衣的不甘想其袍笏登场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所谓出仕，不是顺理成章吗？

文，有时是人的障眼法；人，有时也做文的包装盒。人原是复杂，作家又是复杂的人。固然，我们也可以只理会作品而不问作家其人，譬如小孩子把“朝辞白帝彩云间”念得琅琅，却未必记住谪仙人的大名。但是，假若对文学作品不止于读，要进一步求解，求会心，想躲开作家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我们因此便有了一簿自古至今无论如何都清理不完的，作家与作品的乱麻帐。

我现在所要说的是，郁达夫在现代作家中迥异的风格，他尽其最大限度地在作品里公开着自己，无论美的丑的，生活的精神的，他因而也就活在他的作品的世界。他的作品流传至今，他的人也依旧是鲜活的。

我们很难断定文如其人与文非其人孰高孰低。况且文学本就未必要求真实。可是，人生于世，我们所惯见的，是人人将其心灵努力封锁，仿佛胸腔内装

的是铁皮匣子，我们便不能不觉郁达夫的可贵与亲近。他的好处不仅仅是便宜研究家，读他的作品，直如我们又多了一位赤诚的朋友，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那么，就来谈谈我们的这位朋友，虽然我的所知是十分肤浅。

达夫平生有两种重要的苦闷吧，一是新与旧的迷茫，一是才与俗的不融。这两种苦闷的焦点是他的3次婚姻悲剧。

他在热烈地追求后来与他共同生活13年的夫人王映霞时写的情书，解释过他的第一次婚姻：“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做主，在我3岁的时候定下的。后来我长大了，有了知识，觉得两人中间，终不能发生出情爱来，所以几次想离婚，几次受了家庭的责备，结果我的对抗方法，就只是长年地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后来因为祖母的病，我于暑假中回来了一次——那一年我已经有25岁了——殊不知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地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避得无可再避，就只好想了一个恶毒法子出来刁难女家，就是不要行结婚礼，不要用花轿，不要种种仪式。我以为对于头脑很旧的人，这一个法子是很有效力的。哪里知道女家竟承认了我，还是要我结婚，到了七十二变变完的时候，我才走投无路，只能由他们摆布了，所

以就糊里糊涂地结了婚。但我对于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结婚之后，到如今将满六载，而我和她同住的时候，积起来还不上半年。因为我对我的女人，终是没有热烈的爱情的，所以长年地飘流在外，很久很久不见面，我也觉得一点儿也没有什么。”（1927年3月4日）

郁的这番解释，实在只是套用那时反对包办婚姻的公式化说法，与其具体情况多有出入。被郁称作“我的女人”的孙荃，和郁同为浙江富阳人，两人是否“3岁的时候定下的”，我在旅中无从可考，但在他1913年东渡扶桑时，临行前一日还约会了已具其未婚妻身份的孙荃。这次约会亦是初会，郁的印象是，“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彼时孙家欲促完婚，达夫以即将赴日，“母老矣”，不能为之养妻子为由婉拒，可他在见过孙荃的次日，寄诗给孙荃，口气则俨然以未婚夫自居，而且定下5年之期，“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闺再五年”。又；“立马江浔泪不干，长亭诀别本来难。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更有《为某改字曰兰坡名曰荃》一首：

题君封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

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距“赠名”二日，达夫又赠孙荃诗云：“相思倘化夫妻石，汝在江南我玉关。”

从这些诗作里不难看出郁对孙的好感且对于这桩婚事的认可，甚至主动为孙取名与字，孙另名潜媛，疑同出达夫之手。孙工诗，颇具国学根底，郁对她相貌平平固觉遗憾（后来的王映霞除在相貌上超过孙，别则实在无甚），但不知不觉间已引孙为知音，初会后数日内，寄孙荃诗达十几首之多。达夫抵日后，两人以诗唱和鱼来雁往不曾间断，孙诗极缠绵，如，“笑不成欢独倚楼，怀人望断海南州。他年纵得封侯印，难抵春闺一夜愁。”郁以为孙诗“颇可诵也”，自家也有“君去吴头侬楚尾，知音千里抱孤琴”的动情之语。郁在致王映霞信中的“避婚”说实际是不存在的，至于暑假归国被“捉住”，“糊里糊涂地结了婚”，更是靠不住。他1920年夏回富阳前，他的诗友富长觉梦（蝶如）所作《送郁达夫兄归乡》，已然传达出郁将成婚的消息。郁在新婚际有诗，“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明知此乐人人有，总觉儿家事最奇”，其愉悦之状是决计非“糊里糊涂”的。他婚后大病一场，病愈后再返东瀛，夫妻合作有《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郁到日本后即有《寄内五首》，“当时只道难离别，别后谁知恨更深”，又，“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百年人世多风雨，不及泉台岁月长”。用情较婚前又深许多。

由这番引证，郁对孙荃婚姻的解释，似乎是欺心之论。孙的方面不能不视郁为薄情郎。

讲理，郁或无可辩解；情的一面，似乎又有周旋的余地，症结在达夫的日本生活。

郁达夫自17岁至26岁(1913~1922年)间留学于日本的东京及名古屋。在此前，他出生于人家不满三千且大部分人家“可以不备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的偏僻乡村小城；七八岁读私塾，念“人之初，性本善”；9岁能诗，由一位迂腐迷信的老秀才陪伴到杭州考中学的时候，“船开了……到了县城极东面的几家人家也看不见的时候，鼻子里忽而起了一阵酸溜。正在和那老秀才谈起作诗的话，也只好突然中止了，为遮掩着自己的脆弱起见，我就从网篮里拿出了几册《古唐诗合解》来读。但事不凑巧，信手一翻，恰正翻到了‘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里不能言，肠中车轮转’的几句古歌，书本上的字迹模糊起来了，双颊上自然止不住地流下了两条冷冰冰的眼泪”。中学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吴诗集览》、《庚子拳匪